

English

下载中心

首页

网站地图

关于 IWEP

研究课题

研究人员

研究成果

数据库

出版物

媒体报道

研讨会/讲座



学术论文

《战略与管理》2004年第4期

[\[PDF全文下载\]](#)

中国与亚洲金融合作中的政治经济学

国际金融研究室 章奇

伴随着贸易、金融全球化浪潮席卷全世界，在欧洲货币一体化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刺激下，是否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亚洲金融合作，已经成为摆在亚洲国家决策者案头的紧要问题。目前有关亚洲金融合作的各种讨论大多从纯粹经济学的角度出发，通过不同方案的成本——收益的对比判断各种方案的优劣，却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一项有效的国际制度安排不仅涉及绝对收益——成本的比较，也是各个国家内外部政治、经济集团的博弈和利益分配结果。亚洲地区，尤其是东北（南）亚地区，是目前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同时也是各种国际政治、经济矛盾异常集中的地区。该地区各国政治、经济力量的不均衡发展，正导致该地区原有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影响着地区政治、经济权力重新分配以及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形成。国际形势的这种剧烈变动，既意味着新机遇的不断诞生，也意味着地缘政治经济中不确定性的不断增长。这种瞬息即变的国际环境，既有可能催生新的制度安排（需求诱导），也有可能导致新制度安排因为囚徒困境而胎死腹中（供给失败）。

换言之，一项有效的制度安排（例如潜在的亚洲金融合作方案），不仅仅取决于该方案所能带来的总体政治、经济福利的增加，也取决于该方案可能会带来的新增政治、经济福利在各国内外外部政治、经济集团间的分配情况。前者涉及绝对利益的增减，后者则涉及利益的具体分配。那些仅仅在经济上有利可图，但因为在政治上分歧巨大而失败的案例不计其数。显然，一项新的国际制度安排最终能否得到认可并建立起来，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个政治经济问题。

本文正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来分析中国应对亚洲金融合作所持态度，以及在其中所应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和应采取的对策，以期为未来的决策提供有价值的理论框架和依据。

我们将首先从历史的角度，在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下，分析几个有影响的国际金融合作制度安排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并结合对当前有关亚洲金融合作的背景以及进展的分析，总结出国际金融制度形成的历史经验；其次，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归纳出金融合作的规律性；最后，具体分析中国在亚洲金融合作中的根本利益及其所处的地缘政治经济环境、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在亚洲金融合作中所应把握的原则，以及在短中长期所应采取的基本对策。

一、金融合作的历史溯源

1、布雷顿森林体系

准确地说，以固定汇率制度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二战后第一个成功的国际金融制度安排。由于种种原因，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了，但包括IMF 在内的其主要组成机构却依然得以保留并发挥作用至今。虽然从实际发挥作用（1958 年）到崩溃（1973 年）只有十余年时间，但布雷顿森林体系却堪称二战以来第一个国际金融合作制度的典范。

布雷顿森体体系的建立可谓应运而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结果之一就是美国的政治经济实力在全球范围内处于无

可争议的支配地位。二战刚结束时，美国的产出占全球产出水平的40%，黄金储备更占全球黄金储备的2/3。再加上完整无损的工业以及遥遥领先的军事、技术优势，使美国无可争议地以西方世界领袖的身份建立新的经济新秩序，即布雷顿森林体系。该体系主要致力于稳定汇率，促进平等贸易关系，迅速重建被战争所破坏的经济并使穷国恢复发展。其中的核心机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第二，其他(IMF)会员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即同美元保持固定汇率关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实际上是一种国际金汇兑本位制，又称美元—黄金本位制。它使美元在战后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美元成了黄金的“等价物”，各国货币只有通过美元才能同黄金发生关系。从此，美元就成了国际清算的支付手段和各国的主要储备货币。

按照美国的设想，这样一种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金融制度安排将会给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经济带来好处：第一，它体现了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由于美元成为国际支付手段和主要储备货币，使美国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征收巨额铸币税，理论上可以通过无限货币发行为美国的储蓄缺口进行融资，同时相对于其它国家，保证了美国国内政策的灵活性。这样一来，美元作为国际主要货币地位使美国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调配资源。与此同时，由于该体系消除了货币波动，从而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贸易和投资，恢复各国的购买力和加速经济复兴，刺激对美国产品的需求。从而达到一举双得的目的。

美国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也承担了巨大的义务，一是美国是唯一准备应外国政府和中央银行的请求将自己的货币兑换成黄金的国家，即必须保持美国的黄金可兑换。这也是导致后来布雷顿森林体系不堪重负并崩溃的直接因素；另外，为了启动该体系，美国除了成为IMF的最大出资国外，还必须向西方国家提供巨额资金援助，以加速后者的经济复兴过程。在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谈判中，美国代表怀特曾经设想由美国出资建立起国际储备的金额只需50亿美元，但实际出资金额远远超出了怀特的估计。例如启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第一个步骤就是由美国向加拿大和英国提供37.5亿美元的长期低息贷款，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另外就是为创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注入巨资，为此美国承诺在连续两到三年的时间里每年提供相当于美国GNP2%的援助(按90年代初的价格计算为每年1000亿美元左右)。另外，向另一个盟国日本以及其它次要盟国所提供的援助也是不计其数。

即使必须承担高额的成本，但美国在权衡新的世界秩序所带来的利弊后还是不遗余力地推动布雷顿森林体系尽快发挥实际作用(沃尔克、行天丰雄，1996)。事实上，该体系在成立后的10多年内运转稳定并发挥了令人满意的作用：世界贸易额迅速上升，而欧洲和日本也很快恢复并超过了二战前的最高水平，不仅如此，它们的经济增长率在50-60年代末大多数时间内都大大超过了美国的经济增长率。

这种大国间不平衡的经济增长导致二战刚结束时国际经济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在1955年，按市场名义汇率计算，日本、法国和德国GDP占美国GDP的比重分别为6%、12%和11%，到1970年则分别为20%、14%和18%。

这种经济力量对比的相对变化对布雷顿森林体系造成了深远的影响：第一，它使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内在缺陷，即“特里芬难题”益发凸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转依赖于人们对美元的信心，只要人们相信持有美元比持有黄金更好，人们就愿意持有美元，布雷顿森林体系就会运转正常。反之则出现问题。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向世界供给美元的唯一途径是通过经常项目的赤字，然而该赤字越大，对美元的信心越可能动摇。在二战刚结束时，美国庞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使世界对美元充满信心，并且美国并无经常账户赤字之虞。但到60年代，其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无论在产出的增长，还是在保持价格稳定等方面的表现均大大优于美国，这样一来，当1965年美国第一次出现经常账户赤字且规模不断扩大之后，世界对美元的信心也开始承受越来越严峻的考验；第二，伴随着与美国经济的相对差距不断缩小，那些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大国对美国独自支配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不满也越来越明显。随着越战的升级，1965年法国总统戴高乐率先将这种不满公开化，他抱怨“美元体系”给美国提供了“过度特权”，使美国能够自由地在全世界为自己筹措资金，使自己的国际收支逆差不受限制地用美元结清。在联邦德国，虽然作为二战的战败国而不像法国那样咄咄逼人，但也表示德国由于丧失了货币政策的主权，而导致本国正遭受从美国进口的通货膨胀的威胁，从而表达了要求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愿望。而在美国，由于越战的挫折以及欧洲、日本经济的重新崛起，使得美国当局对独自承担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稳定的义务也怨声载道。显然，在国际政治、经济力量对比发生大变化的条件下，一种严重依赖一国的国际体系的不稳定性也越来越大。

政治人物的表态使得市场对美元的信心大跌，美元贬值的压力不断升高，而主要欧洲国家拒绝和美元贬值进行联动。终于在1973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不再和黄金挂钩，不再承担黄金自由兑换的义务。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此瓦解。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发展史是考察国际金融合作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极好的案例。该体系在其创立时完全符合了当时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特征和需要，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布雷顿森林体系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给主要参与国均带来了好处：在一个汇率稳定的国际环境下，工业国家间的贸易额实际年均增长6%，而经济增长率亦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例如美国在50、60年代的平均增长率达到6.6%。但对于其它工业国家而言，美国的市场开放以及它所提供的集体安全远比它们从布雷顿森林体系中所得到的要更加重要，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的历史无疑证明了这一点。换言之，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利益和责任分配存在着严重的不均衡，这种不均衡所带来的各国间的矛盾随着欧洲、日本经济力量的恢复而日益尖锐并最终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

2、欧洲货币体系

在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摧残之后，欧洲国家痛定思痛，普遍认为惟有建立起制度化的合作机制，才有可能使欧洲国家在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争端，避免重蹈两次大战的覆辙。欧洲的和解与创建符合战后美国的战略利益，为此美国规定通过马歇尔计划提供的资金要以欧洲各国的合作为前提才能获得，这客观上加速了欧洲一体化的速度和进程。继1948年成立“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经济合作组织的前身）和“欧洲支付同盟”之后，1950年又成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该组织的成立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它成为法德和解的经济基础，另外，欧盟的许多组织机构的前身也可以追溯到欧洲煤钢共同体。但是，直到1969年才在沃纳报告中正式提出了推动货币一体化，最终实现固定汇率和共同货币政策的目标。之所以欧洲货币一体化直到此时才被提上议程，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货币一体化是欧洲一体化的高级阶段，在客观条件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前，货币一体化也不会有实质性的进展。第二，到60年代后期，由于美欧之间经济差距的缩小，对美元霸权的反对也日益明显，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德两国认为对抗美元霸权的最佳途径就是加快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第三，到60年代末，欧洲经济力量的分布格局已经基本稳定。从1971—1998年，法德两国的GDP占欧洲货币联盟国家GDP总和的比例一直稳定在56%左右，其经济实力在货币联盟成员国中稳居支配地位。

正如二战刚结束时美国的全球经济霸主地位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得以建立的前提和基础，法德两国在欧洲大陆的经济霸主地位同样是欧洲货币一体化的支柱。正是这种稳定的经济格局，使得一种制度安排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维持原有的利益分配关系而不致引发冲突。70年代末在法德两国的倡导下，欧洲货币体系与欧洲汇率体制得以建立。除英国外，所有欧洲联盟国家均加入了欧洲汇率体制。在汇率体制下，每一种货币的汇率都在一个带状区间内按照各种两种货币兑换的中心汇率上下波动（最初区间为2.5%）。一旦某种货币的汇率达到区间的边界，有关国家的中央银行就会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干预。显然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固定汇率制度。

欧洲汇率体制在90年代初因为各种金融危机的冲击而无法完成欧洲货币联盟的主要目标，但欧洲货币一体化的进程并未就此中断。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其中规定了向经济与货币联盟过渡的精确程序，成为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中的里程碑事件。根据《马约》，1998年成立了欧洲中央银行，1999年正式启动欧元，2002年欧洲货币联盟11个成员国的本国货币全部终止流通而由欧元取代，从而完成了欧洲货币一体化。

在法德两国经济力量占支配地位的情况下，欧洲货币一体化仍然花了近50多年的时间，除了各国经济结构存在差异外，对欧洲货币一体化中利益分配的政治分歧也是重要原因之一。首先，欧洲央行的首要目标是维持物价稳定——这实际上反映了德国的意见，但欧洲各国文化、经济条件差异巨大，是否应该为了维持物价稳定而以放弃其它目标为代价并把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全部移交给欧洲央行在政治上是非常棘手的问题，短时间内不可能达成一致意见；其次，即使在核心国家之间，也会由于政治经济实力发展的不均衡而在利益分配上存在分歧。例如，鉴于德国经济在该区域内所占的主导地位，德国成为欧洲汇率体制下的支配国家，汇率体制因此也被看作是德国马克区。这意味着德国德中央银行开始主导该体制下成员国的货币政策。这引起一些国家尤其是法国和英国的疑虑。由于欧洲货币一体化必须争取到法国的支持，因此德

国在这一过程中进行了让步，例如在欧洲央行的决策机制设计上，并不是根据经济力量的相对大小分配决策权，而是根据董事会“一人一票”的原则进行投票。这样，在欧洲历史上拥有更多传统盟友的法国就可以对欧洲央行的决策施加较大的影响力。在欧洲央行行长的任命上，法德两国也曾经出现过激烈的争执。而英国则在欧洲货币一体化上更是态度暧昧，这与英国长期坚持的欧洲大陆均势政策的外交思维是分不开的。

尽管分歧重重，在推进欧洲一体化这一大方向上法德两国的战略利益是一致的——两国均需要更紧密的合作来获得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更高地位。更关键的是，尽管德国拥有经济上的霸权，但由于是二战的战败国，其政治上的影响力受到限制，必须在重大问题上得到法国支持；而法国则希望通过法德联合主导欧洲内部事务，并以此作为在国际上拥有更大发言权的筹码。在法德两国任何一方均不具备完全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联合与合作则成为最佳策略。而法德一旦联合，包括货币一体化在内的欧洲一体化也就大局已定。

欧元诞生至今已经将近20年有余，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只要法德两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力量对比不发生大的变化，且在联合主导欧洲事务以应对美国霸权上仍然意见一致，那么欧元的运行仍会大致平稳。否则，欧元乃至欧洲一体化形势出现逆转也并非是不可能的事情。

二、金融合作中的政治经济

.....

三、中国与亚洲金融合作的政治经济分析

虽然目前亚洲金融合作还没有一个成熟的框架，但许多国家的官方和学术界(尤其是日本)对亚洲金融合作均倾注了巨大的热情。首先是日本在1998年提议由亚洲国家建立一个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来补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当亚洲出现危机时，由亚洲货币基金组织首先进行救援。这一方案虽然一经提出便夭折，但却将亚洲金融合作的议题提上了日程。接着在2001年，5月亚行年会之后召开了第一次同行意见会议，讨论的主题是加强东亚的金融合作。与会者一致同意加强政策对话和区域合作，包括对资本流动的监管、建立自助和支持机制、促进国际金融改革。同期东盟10+3会议上，各国财政部长在泰国达成清迈协议，在双边货币互换以及建立货币风险早期预警系统等方面达成一致意见。从而在亚洲金融合作上迈出了标志性的一步。

亚洲金融合作问题之所以备受关注，主要出于以下原因：

(1) 亚洲金融危机的刺激。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使亚洲各国萌生了加强金融合作，维护金融稳定性的念头；

(2) 区域经济一体化进展的要求。时至今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为标志，本地区的经济、贸易一体化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区域内的贸易额成为本地区贸易的最大驱动力。经济联系的进一步深化对本地区金融合作的加强也提出了要求。这和欧洲经济一体化与货币一体化的联系是一致的；

(3) 本地区政治经济力量与地区民族主义的崛起。亚洲地区尤其是东北亚地区是近20年来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再加上本地区曾经饱受西方列强欺凌的历史，因而经济的复兴很容易伴随着民族主义的苏醒，并进而兴起挑战和改变世界现存经济秩序的冲动。尽管动机各有不同，但加强金融合作却是挑战现存世界经济金融秩序的一个可选择的途径。

正如我们在考察国际金融合作的历史案例时所指出的那样，考察亚洲金融合作的可行性和稳定性，就不能不考虑中国政治、经济实力的变化及其对亚洲未来新秩序的影响。

1、中国在亚洲的地缘政治与经济背景

.....

2、中国国内政治经济背景

.....

3、中国与亚洲金融合作：原则、作用与对策

1) 原则

根据第二节中对国际秩序稳定性分析，并本节对中国发展阶段的划分，我们认为中国在未来的亚洲金融合作中应至少把握住以下原则：

(1) 未来的亚洲金融合作应该充分考虑亚洲经济、政治格局将发生的变化，即充分考虑亚洲新兴国家未来的成长趋势，以使亚洲金融合作框架拥有足够的弹性反映变化中的力量对比；

(2) 中国参加亚洲金融合作应与中国在各个时期（见表1）的发展阶段与国际实力相匹配，以不损害长期内中国的政治、经济利益为底线；

(3) 在亚洲金融合作中，短期内中国的利益不能受到损失，长期内则要在争取共赢局面的同时获得和中国国际地位相称的政治、经济收益。

(4) 在亚洲金融合作中要充分考虑不同时期国际强权的反应，最大限度地争取统一战线，以保障中国的和平崛起。

2) 作用和对策

在短期内(2003-2009 年)，中国仍然属于低收入水平国家，主要精力应该放在深化国内改革与发展。在亚洲金融合作中的作用应体现在完善现有金融合作安排，落实已达成的各项金融、贸易协定，进一步紧密同东盟以及其它亚洲重要国家之间的经济和政治关系；该阶段可以考虑进一步推动两岸三地的贸易、金融联系；与此同时尊重现行国际秩序；

在中期内(2010-2018 年)，此时中国已经基本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可以也应该在亚洲和世界舞台上更大的作为。这一阶段中国在亚洲金融合作中所起的作用是：(1) 在全面落实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同时，可以通过向其它亚洲国家进一步开放市场以加强同亚洲国家(尤其是印度、中亚和俄罗斯远东地区)之间的经贸联系，集中精力推动亚洲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为进一步发展金融合作打下基础；(2) 利用两岸三地的联合优势，在大中华经济圈筹建区域金融中心，发展地区金融市场，并优先鼓励人民币在中亚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使用；(3) 应尽量争取日本与中国的联合，说服日本放弃建立日元区的企图，转而构建包括人民币和日元在内的亚洲一揽子货币篮子，作为未来亚洲货币的发行基础；(4) 在这一过程中应充分考虑东盟国家和韩国的利益，同时应该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将印度也拉进亚洲金融一体化的建设过程。总之，这一阶段将成为决定亚洲金融合作未来走向和成效的关键阶段。

在中长期内(2019-2027 年)，中国将成为亚洲第一大经济实体，新的亚洲政治、经济新秩序应该在这一阶段完成重构过程，为此中国的作用应该体现在：(1) 应该成为亚洲地区的经济的发动机和领头羊，为亚洲国家的出口和经济增长提供市场和动力，推动亚洲经济、金融一体化进程；(2) 应该使人民币或者以人民币为主要权重的亚洲货币成为亚洲国家主要储备货币和交易单位；

在长期内(2028-2067 年)，中国将赶超并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此时中国的作用范围应该超越了亚洲区域范围，而在全球框架下谋求改革原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以使国际格局反映全球实力对比的新变化。

从2004-2067 年还有相当长的时间，其间世界形势究竟会发生什么变化并不为人所晓，但作为一项长期性的战略规

划与设想，中国在这段时间内至少应当采取如下策略，以保证中国在每一阶段的战略利益：

(1) 符合地缘政治、经济的要求，首要完善并深化同周边国家的关系，积极推动两岸三地的经济和金融一体化，稳定同美国、日本的关系。

(2) 应该充分吸取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失败和欧洲货币一体化相对成功的历史经验。历史经验表明，从长远来看，集体联盟要比单个霸权国家支配下的国际秩序更具稳定性和灵活性。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的经济总量仍将低于日本和美国，以人均收入水平来看更是将长期处于相对较低阶段，因此，在金融合作中应该充分联合本地区大国，争取日本、印度等国的合作，以建立起类似法德轴心的支配性国家联盟；

(3) 布雷顿森林体系和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历史经验还表明，一个开放、稳定的市场要比单一的金融一体化更加重要，没有前者，后者不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因此，应该在亚洲金融合作中提倡优先完成贸易自由化和市场一体化，在这一基础之上完善金融合作。

推荐好友

相关文章

■ 孙杰 深化亚洲金融合作的途径：日本的作用和影响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5期 (2007-5-29)

本站的署名文章均属作者本人的观点。希望转载时，请事先与我们联系。

院首页

网站声明

会员登录

联系我们

下载中心

院图书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Copyright (C) 2002-2008 中企动力提供技术支持 请使用 1024*768 分辨率

地址：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编：100732 电话：010-85196063 传真：010-65126180 联系本站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编号：京ICP备06059776号